

# 克娜蒂娅的青春百岁

薛忆洵

文学的相遇：从中国不远万里来到加拿大的最小的粉丝，走近了她——在《笔会》文章里“遇到”的克娜蒂娅——她喜欢的作者的最老的粉丝。



有点担心。接着是在她最应该在家的时间给她打过三次电话，她都没有接听，我的担心变成了紧张。我又耐心地等了两天，因为我知道蒙特利尔市最大的英文报纸在那两天将再次登出对我的专访。克娜蒂娅是那家报纸忠实的读者，以前哪怕是报纸上有任何一点关于我的消息，她都是第一个看到和第一个通报。而这一次，配有我醒目的照片的专访是作为新闻登在报纸的第二版，她居然没有任何反应。我知道一定是出了大意外。调查的结果是：她已经住院一个星期了。具体的经过是：她那天结束冲凉的时候突然晕倒在了卫生间的地板上。醒来之后，她自己爬回房间给小区保安打了电话，接着保安叫来救护车，将她送进了医院。

大错误差点在2018年3月底（也就是她96岁生日前不久）的那一段时间。莫名其妙又突如其来的大意外令克娜蒂娅对自己的自理能力产生了怀疑，而平时与她来往密切的两位远亲也趁机想说服她彻底放弃独立的生活，搬去老人院。她们带着她去了附近的两家条件很好的老人院。可是，就在最后准备在入住合同上签字并交付定金支票的时候，克娜蒂娅突然犹豫了。她说她还再考虑一下。当天下午，她来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去她那里。她这时候才语气沉重地告诉我她自己最近在忙着什么，接着又征求我的意见，问她是否应该搬去老人院。出于个人的目的，她当然不想她搬走，因为这些年来，她纯朴又积极的生活就像是照亮我自己生活的一盏灯，我希望自己在疲惫和绝望的时候一抬头就能够看到这盏灯；而出于对她本人的考虑，我就更加反对她搬去，因为我知道她对现在的生活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环境）有多么依赖。离开了这样的环境，我担心她的精神状态很快会变坏，身体状况很快会变更差。但是我很清楚克娜蒂娅需要的是不是繁琐的评估，而是简单的结论。“你才96岁，就去什么老人院。”我好像是开玩笑似地说。我的话果然立竿见影，克娜蒂娅立刻就恢复了青春的常态；她首先顽皮地模仿了一下她在老人院看到的那些老人的样子，说将来每天看着那种样子的邻居，自己肯定很快也会变成那种样子。她接着又不屑地描述了一下老人院的居住环境，说她这样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不可能忍受那样的压抑。她最后得意地告诉我，其实我说什么都不重要，因为她已经做出了继续“原地不动”的决定。

除此之外，95岁以来的这三年里，克娜蒂娅还是一如既往地活泼，一如既往地“计算”，一如既往地幽默，一如既往地谈笑风生，一如既往地挺胸直背，一如既往地健步如飞……她有的时候会抱怨那场医生始终查不出原因的大意外“严重损害”了她的记忆力，自己的生活已经没有了既往的质量。“经常”是事实，因为我注意到她现在经常会重复说自己刚说过的话，而“严重”是夸大，因为有一天我无意中提起我以前会唱一些苏联的歌。在我哼出《喀秋莎》的曲调之后，她马上用俄语热情洋溢地将整首歌全部唱了出来，而我自己甚至连它的中文歌词都已经忘得精光。

尽管克娜蒂娅这三年的生活一如既往，里面却还是有许许多多新鲜的花絮值得与读者分享。比如有一天，她拿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张卡通画给我看，我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看到里面的文字部分出现了“爱沙尼亚”一词。她得意地解释说她很少在报纸上看到她的祖国的名字。而我觉得无法解释的是，要有怎样的敏锐她才可能从当天那一叠叠的报纸里捕捉到那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个完全是意外地出现在卡通画里面的词？又比如有一天，我无意中问起了她是在哪家诊所配的假牙。“假牙？”她说，大笑了起来。接着她告诉我，她从来没有“那种东西”。她说她一口整齐的牙齿都是与生俱来的。不过，她指给我看右侧下排的一个牙洞。她说那是二战后在欧洲大陆逃难的日子里因为营养不良掉落的牙齿。那是她自幼换乳牙以来掉过的唯一的一颗牙齿。我没有想到她是一个这样的“真人”。我相信她的牙齿肯定也是医生们永远查不出原因的奇迹。

还有一件事令我特别感动：有一天我在一本兰登书屋出版的关于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历史著作中读到当年帮助流亡欧洲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们获得首笔德国资助的是一位爱沙尼亚的外交官。因为我们以前谈起过十月革命、列宁以及那著名的资助，但是我们都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与她的祖国还有如此的瓜葛。在接下来的一次见面的时候，应克娜蒂娅的要求，我将那大部头带到了她那里。我们一起讨论了那两段相关的内容。克娜蒂娅给我分析了一下那位外交官的姓名，又拿出欧洲地图查对了一些地名。最后，她还要我将那两段内容复印给她，她还想再仔细研究。

还有一件事令我特别开心。离圣诞节还有一段时间的一天，我注意到她在窗口拉起了一根细绳，将刚收到的三张贺卡陈列在上面。接下来的日子里，贺卡的数量每天都在增长，而我从她的楼下经过的时候，总是好奇地停下数一数。不过，有一天上午散步回来，我意识到她的贺卡展览有一个很大的不足，马上打电话告诉她我每天在数她收到了多少贺卡，但是我也想“看”她收到的贺卡。我建议她改变展览的方式，将贺卡的正面对着窗外，这样所有路过的人就能够欣赏到她的贺卡。她也觉得我这是一个好主意。过了三个小时，我午餐后散步回来从她楼下经过的时候，看到了她的贺卡果然就一致对外了。我又给她打电话感谢她带给我的享受。同时我又建议说，如果她自己在家里看着贺卡的背面感觉无聊，也不必一致对外，每天也可以轮流将一部分贺卡的正面对着她的房间。她觉得这是更好的主意，从此以后，每天都会重新布置。

写到这里，我想起克娜蒂娅这三年的生活里还发生过另外的一件“大事”：那是对我的文学生命充满象征意义的“大惊喜”。出生于1922年3月19日的克娜蒂娅是我最早的粉丝。她读过我的《深圳人》和《白求恩的孩子们》的英文版，不仅自己喜欢还多次用它们做圣诞礼物送给世界各地的朋友。而因为她的推荐，她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姨侄女（她还健在的100岁的姐姐的女儿）成了我的《空巢》瑞典版的第一读者。克娜蒂娅这一“最老”的地位无疑是永远都无人替代的。而出生于2008年10月27日的冯采薇到目前为止是我最小的粉丝。她2017年的夏天追星追到了我在北京“老书虫”书店的活动上。那是我们的

第一次见面。当时她还不到9岁，已经读完了《空巢》，而且非常喜欢。而她接着甚至准备挑战曾经“只有15个读者”的《遗弃》，当然被我及时劝阻，我希望她能够选一本比较积极的书。一年之后的暑假，蒙特利尔成为我最小的粉丝首次北美之行的第二站。利用这次机会，我安排她与克娜蒂娅见面。看着自己最老的粉丝和自己最小的粉丝那样亲密地定格在一起，我不禁为文学的神奇充满了惊叹。86年的年龄之差、万里迢迢的地域之隔以及完全的语言之别和彻底的文化之异……所有这一切都无法阻止文学的相遇！这就是文学的神奇。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当然只是一朵很小的花絮，而对于我个人的文学探索来说，这却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路标。

从接到克娜蒂娅元旦晚上那两个“骚扰电话”到现在已经将近两个月过去了。这是整个世界都极不平静的两个月，也是我自己最漫长和最艰难的文学长征之中最艰难的两个半月。在这两个半月的时间里，我与克娜蒂娅只有两次在冰天雪地的街面上的偶遇。但是从我们的寒暄里，我知道她很担心世界的状况，也很关心我的进度，只希望笼罩着世界的灾难早日过去，也盼望堆压在我身上的重负尽快结束。她对她的关心让我有一天突然意识到那两个“骚扰电话”也许同样是出于她对我的关心，她也许真是不希望我在元旦的晚上还继续按部就班地工作。而听到她的担心和关心，我也总是将责任推到她的身上。我说我和世界都在等着她的生日；等到她98岁生日的时候，我的写作就能完成，而世界的状况也应该趋于好转。我的这前半句话已经在她生日之前十天成为现实。我这次正式开始于2018年11月底，几乎没有一天停顿的文学长征终于在2020年3月8日中午12点22分（北美东部夏令时）结束。而我的后半句话现在看来也至少具有局部的正确性。

2018年六七月份，我多次去克娜蒂娅那里陪她看世界杯足球赛。我这个年过半百的“宅男”完全被她年近整百的“青春”感染，对赛事也紧追不舍，对积分也浮想联翩。而我们又都是外行，看的只是热闹，想的只是“自己”；她想瑞典队赢，因为她姐姐现在居住在那里；而我想英格兰队赢，因为我姐姐现在居住在那里。万幸的是，这两支球队都有异常又出色的表现。赛事进行到四分之一决赛的阶段，我们还能够携手并进。不幸的是，接下来那场你死我活的四分之一决赛却是在这两队之间举行。开赛之前，克娜蒂娅特意倒了两杯酒，我们碰杯真心地祝贺彼此的球队都能够走到这一步，接着又都虚伪地祝愿对方的球队能够走到下一步。不过终场的哨声吹响之后，克娜蒂娅马上表示出了高姿态，说她从此会站在我一边，支持英格兰队。遗憾的是，克娜蒂娅充满青春活力的加盟并没有能够给英格兰队送入决赛。随着英格兰队的出局，我们的热闹就抵达了终点。我马上就想到了四年之后的下一次，马上就与克娜蒂娅约定下一届世界杯我们还是在她家里一起看。她首先是满口答应，接着她“计算”出了那正好是她满100岁的年份。她没有因此显出丝毫的犹豫，而是再一次更加肯定地满口答应。

“青春万岁”大概是有所有年轻人都曾经有的狂想，而“青春百岁”大概是什么百岁老人都不敢有的奢望。但是，我肯定两年之后这奢望会变成克娜蒂娅的“现状”！我期待着克娜蒂娅在735天之后的兑现。我也期待着在接踵而至的世界杯足球赛上，我们有一支自始至终都共同支持的球队。当然，我更期待着那支球队不仅与我们都沾亲带故，还有超群的实力和超强的激情，能够将克娜蒂娅青春百岁的语气一直带到最高的领奖台上。



陈丹燕

## 码头城市的血缘

那还是在伦敦的一个礼拜天的早晨，许多年前。  
在泰晤士河边的金丝雀码头附近，远远看得到西印度码头那里的仓库，现在是个博物馆了，闭着门。  
金丝雀码头区，与东远的贸易大多集中在这里装卸。过去总是日夜繁忙，现在总是灯红酒绿。那天却是个意外，礼拜天清晨，长长河岸上没有人，只有一只铁锚竖着，如今它是个纪念碑。  
河岸上能看到泰特美术馆的大烟囱，当然它不再冒黑烟了，河里也不会再有黑乎乎的运煤船。如今它不再是发电厂，而是收藏和展览现代艺术品的美术馆。  
去格林尼治的路上，看到有些原来的船坞和仓库已改造成了公寓。礼拜天早晨，每个无人的阳台上漂浮着深深的睡意。  
当石油代替了煤，洲际飞机代替了远洋船，时代就变了。  
码头就静下来了。  
有个问题静静地浮上心头：金丝雀码头上的码头工人有码头号子吗？  
工人为了合力搬运货物时协调步伐，这是码头号子诞生的缘由。这样说来，只要有码头，在没有机械化，也没有集装箱运输的时代，就会有扛大包的码头工人。只要有码头工人干活，就会有码头工人号子。四个人一起装卸，有八个人用的号子；八个人一起装卸，有八个人用的号子；搬货物上船，有齐心向上的号子；搬货物下船，有齐心向下的号子。  
上海码头上的工人这样唱：三级跳板！嗨——喂！大胆上去！嗨——喂！别往下看！嗨——喂！  
伦敦工人是怎么唱的？  
依此类推，德国的汉堡码头上，也一定有汉堡码头工人号子，汉堡工人怎么唱呢？  
因此，南洋的马六甲码头上，也会有马六甲码头工人号子。  
斯里兰卡的加里要塞码头上，也会有加里码头工人号子。  
东洋的大阪码头上，也会有大阪码头工人号子。  
香港的中环码头上，也会有香港码头工人号子。  
印度的果阿码头上，也会有果阿码头工人号子。  
这些都是当年东印度公司一路东行路过的码头。  
我期待自己能听到这些声音。

早就听说过，英国的利物浦码头上海码头的样子非常相似。在利物浦，曾经有一批航海时代随船而去的中国海员，因为各种原因留在了利物浦码头上，成了码头工人。不知道他们在搬运货物时，是不是能跟得上英国码头工人唱的号子，或者，他们像上海码头上的宁波工人一样，保留了自己的方言号子，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社会。  
宁波帮的码头工人号子，用宁波话唱的：  
(甲)哎，上来，E赛格，朝南笃底第五根上跳 E赛格  
(乙)E赛格，朝南笃底第五根上跳  
(丙)E赛格，朝南上跳来上跳  
(甲)EO脱朗，朝南第二根上跳，朝南啊  
(乙)EO脱朗，朝南第二根上跳  
(丙)EO脱朗，上跳来，朝南啊  
不是宁波人还真的听不懂。  
上海码头上，码头工人也分成不同的帮，号子也就分成了本地帮号子，苏北帮号子，湖北帮号子，还有宁波帮号子。那么，汉堡海事博物馆所说的当地码头工人的土话号子，是不是也跟这种语言分类差不多呢？  
汉堡是著名的汉莎同盟城市，那它的码头上，应该有塔林帮号子，哥本哈根帮号子，还有斯德哥尔摩号子？就像同样是口岸城市的汉口与宁波，它们的方言在上海码头上流传着。

印度的孟买有着一条跟上海外滩相似的水边大道，甚至 Bund（外滩）这个词，都是从印度传来上海的。孟买的 Bund，也会夜夜响彻码头工人的号子声吧，就像十九世纪中叶的上海工部局会议记录里提到的，上海外滩码头上夜夜不休的号子声。  
如果我把上海放在海事时代的全球地理上看，能看到码头造就的城市里，上海与伦敦、汉堡、利物浦、孟买、马六甲、大阪是真正的姐妹城市。它们在

诞生的时候、成长的时候，都是夜夜响彻了码头工人号子声的城市。  
这样的城市都有着一种码头带来的节奏。  
也许这些城市的节奏是一样的。  
在2020年春天，我希望自己能在伦敦书展后，去运河博物馆找到伦敦码头的号子。然后，去汉堡海事博物馆听到汉堡的码头工人号子。我希望自己能证实，这些城市散落在世界各地，但却有一种一致的节奏，将它们的遗传链接在一起。  
我希望这一年开始，做这样一个长旅行，沿着码头城市，从欧洲西头到英国渐渐走到亚洲东头的日本，这样的旅行，可以切实地找到自己家乡声音上的遗传。  
上海的码头工人扛着沉重的货物，却唱着男人气的号子：  
搭起来嗨！奥嗨——！起来啦——！走嗨——！  
开步走咯！嗨——喂！脚下小心！嗨——喂！  
三节跳板！嗨——喂！颤颤悠悠！嗨——喂！  
大胆上去！嗨——喂！别往下看！嗨——喂！  
内心平静！嗨——喂！脚底稳定！嗨——喂！  
一根杠棒！嗨——喂！六尺来长！嗨——喂！  
抬走穷根！嗨——喂！喜气洋洋！嗨——喂！  
下了跳板！嗨嗨嗨嗨！快马扬鞭！嗨嗨嗨嗨！  
那位小姐！嗨嗨嗨嗨！走路靠边！嗨嗨嗨嗨！  
身体当心！嗨嗨嗨嗨！不要碰痛！嗨嗨嗨嗨！  
一杠没了！嗨嗨嗨嗨！别忙擦汗！嗨嗨嗨嗨！  
棉包杠完！嗨嗨嗨嗨！有你钱赚！嗨嗨嗨嗨！  
秤米扯布！嗨嗨嗨嗨！吃饱穿暖！嗨嗨嗨嗨！  
我相信，这也许是码头城市共有的乐观，努力生活的热情。这是码头城市不论如何经受灭顶之灾，也总是向往一切会好起来的热情。  
也许码头号子的节奏，真的是四海皆准的。  
也许这就是我在金丝雀码头上突然感到一种巨大寂静的原因。那声音不见了，却不意味着消逝。

但是，2020年1月在全球流行起来的瘟疫，最终迫使世界各国纷纷关闭边境，取消民用航班，停止签证，最终令我取消了所有的旅行。  
三月阳春时分，地球再次被分割成了巴别塔的模样。

(文中号子资料来自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港码头号子》一书)

那还是在伦敦的一个礼拜天的早晨，许多年前。  
在泰晤士河边的金丝雀码头附近，远远看得到西印度码头那里的仓库，现在是个博物馆了，闭着门。  
金丝雀码头区，与东远的贸易大多集中在这里装卸。过去总是日夜繁忙，现在总是灯红酒绿。那天却是个意外，礼拜天清晨，长长河岸上没有人，只有一只铁锚竖着，如今它是个纪念碑。  
河岸上能看到泰特美术馆的大烟囱，当然它不再冒黑烟了，河里也不会再有黑乎乎的运煤船。如今它不再是发电厂，而是收藏和展览现代艺术品的美术馆。  
去格林尼治的路上，看到有些原来的船坞和仓库已改造成了公寓。礼拜天早晨，每个无人的阳台上漂浮着深深的睡意。  
当石油代替了煤，洲际飞机代替了远洋船，时代就变了。  
码头就静下来了。  
有个问题静静地浮上心头：金丝雀码头上的码头工人有码头号子吗？  
工人为了合力搬运货物时协调步伐，这是码头号子诞生的缘由。这样说来，只要有码头，在没有机械化，也没有集装箱运输的时代，就会有扛大包的码头工人。只要有码头工人干活，就会有码头工人号子。四个人一起装卸，有八个人用的号子；八个人一起装卸，有八个人用的号子；搬货物上船，有齐心向上的号子；搬货物下船，有齐心向下的号子。  
上海码头上的工人这样唱：三级跳板！嗨——喂！大胆上去！嗨——喂！别往下看！嗨——喂！  
伦敦工人是怎么唱的？  
依此类推，德国的汉堡码头上，也一定有汉堡码头工人号子，汉堡工人怎么唱呢？  
因此，南洋的马六甲码头上，也会有马六甲码头工人号子。  
斯里兰卡的加里要塞码头上，也会有加里码头工人号子。  
东洋的大阪码头上，也会有大阪码头工人号子。  
香港的中环码头上，也会有香港码头工人号子。  
印度的果阿码头上，也会有果阿码头工人号子。  
这些都是当年东印度公司一路东行路过的码头。  
我期待自己能听到这些声音。

晴雪  
(国画)  
李苦禅